

公法研究 栏目主持人:刘茂林

世界和中国大格局中的“一国两制”

常 乐

(中国人民大学 台港澳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 要:“一国两制”的精髓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范围内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这两种制度的同源性、斗争性、并存性和现代性,都必然要求我们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两种制度的起源、异同、脉络与趋势,了解了这一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对中国“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出台以及该方针政策的实施,才会有更加坚实的理据和自信。

关键词:“一国两制”;世界大格局;香港;澳门;台湾

中图分类号:DF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915(2016)06-0049-07

DOI: 10.16387/j.cnki.42-1867/c.2016.06.008

如何认识“一国两制”这一划时代的制度创举,如何认识“一国两制”实践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如何判断“一国两制”的当前状态和未来走势,则必须将“一国两制”置于世界和中国的大格局中去观察和分析,必须将“一国两制”置于近代以来东西方交通融汇的数百年大历史中去观察和体悟,必须将“一国两制”置于港澳台与中国内地与世界互动所形成的独特历史中间去分析和把握。

一、从世界历史变迁的视角认识和看待“一国两制”

我们都知道,“一国两制”的精髓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范围内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这两种制度的同源性、斗争性、并存性和现代性,都必然要求我们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两种制度的起源、异同、脉络与趋势,了解了这一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对中国“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出台以及该方针政策的实施才会有更加坚实的理据、自信。

(一)“一国两制”是近代以来东西方历史交汇、文化交融的制度遗产和人类政治生活的结晶。

所谓近代社会,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由西欧

率先而起,经济领域实行市场经济,政治领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思想文化领域宣扬信奉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民主、法治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较之东西方传统社会,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进步,从此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以摧枯拉朽之势,从欧洲向全世界传播、征服,造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基本格局。

上述是近代社会的主流,或者是近代社会的上层面向。在其之下,还掩蔽、压抑着广大的底层社会民众,他们受着本国或多国资本和权贵阶级的层层盘剥,生活窘困,民不聊生。由此,近代社会又衍生出批判、反对、敌视以致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职志的社会主义思潮。最为标志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宣扬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并且这一理论也是由西欧不断传向东方的。随着苏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现代性制度并存的局面。从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与实践在一国范围内的斗争,就演变和跃升为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以及阵营与阵营之间的斗争。并且,这两个层面的斗争并没

收稿日期:2016-09-01

作者简介:常 乐(1975—),男,河南杞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研究。

有相互代替,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进一步加剧了各国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但是无论如何,从世界大历史的视野去看,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即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不少内在矛盾和缺憾,但它仍然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运用最广的一种社会制度。它的自身矛盾以及制度缺憾,两个层面得到弥补,一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和资源流动,二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而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链条上最薄弱环节的国家,则没有能力实现上述对外和对内两大范畴当中的革新,因此也只能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然而,从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的最新实践看,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总体表现为对立和制衡,但是一方面国家间的合作是大趋势,另一方面在两种性质的国家内部,也都在吸收着与自身相异的对方的制度要素。总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走着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一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在相互感染、吸收、甚至同化着对方,只是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而已。

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充分反映了截至目前人类社会两大最为优越的社会制度携手共进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而且当前这两大制度各自都未达到时其最佳或最完美的程度,因此二者也都不可能完全取缔或代替对方。为了国家或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二者只有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具体到中国的“一国两制”,就是这种世界大历史的视界及其格局的充分反映。一方面表现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协同合作的浓缩化和一国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一国范围内社会主义主导地位下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及其制度化。再加上港澳台地区的历史特殊性,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拉锯、冲突、合作的最前沿,因此在这三地实施“一国两制”就成为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二)“一国两制”主要是冷战背景下大国博弈和斗争的产物

“一国两制”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正如前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旺盛生命力和在中国内部资本主义因素通过改革开放过程的逐步增长,必然让国家决策者考虑如何处理国家内部特殊地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将要实施“一国两制”的特殊地区——

港澳台所关联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是不同历史时期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初期的葡萄牙,到成熟期的大英帝国,到二战后最为发达的美国,他们在不同时期与中国的接触、交往以致合作,中国都处于相对弱势或劣势的地位。要么昧于世界时势,要么限于自身实力,中国在与这些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交往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妥协、无助的局面之下。当然,这里的中国还是指的清王朝。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中国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秉持了独立自主五项基本原则,以往屈辱、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一去不复返了。由于港澳地域逼仄,远离葡、英,关键是葡萄牙和英国国力急剧衰落,因此葡萄牙早想将澳门拱手送还,英国也十分惧怕中国用武力夺回香港。即使在建国初期,中国若想收回港澳,在国际范围内可能也不会遭到很大的非议和波折。

但是,由于战后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敌对阵营,且两大阵营长期处于“冷战”对峙之中,新中国虽然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美国通过联合国纠集多国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围剿,发动朝鲜战争,给新中国政权的稳定及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带来巨大阻力。中国为了打破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封锁,保持赚取外汇和与西方联系的通道,因此制定让港澳地区维持现状,以实现“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意图。

朝鲜战事结束之后,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容易冲突及引发战争的地区,不是港澳,而是台湾。一方面,蒋介石政权在败退台湾的二十余年间,一直抱有“反攻大陆”的野心,并且在东南沿海不断发动零星和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而其背后,则有美国在资本、武器、人员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新中国虽然有收复台湾、统一全国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但是限于国力、武器,尤其是碍于美国的插手和干预,这一愿望迟迟难以实现。但是台湾当局和以社会主义制度为特色的大陆太平洋西海岸之间的这种动态斗争与军事对峙局面,牵扯了美国太多精力,因此也不是它所愿意看到的。美国也想找到一个既能制衡台湾和大陆,使其处于和平状态,又能保持其在太平洋西海岸的战略超然地位的办法。

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的道路上,苏美是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同盟

的蜜月期,美国与中苏两国都处于敌对状态。这时美国指示台湾在两岸关系上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其逻辑是:如果台湾反攻大陆的动静过大,中国将会全力以赴,美国因是台湾的军事盟友必然要帮助台湾,而苏联作为中国的盟友也会加入战团帮助中国。因此,中苏联手武力对抗美国,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就逐步改变对华政策,准备联手中国以制衡苏联。因此,中美建交提上日程,而横亘在两国之间的最为重要的台湾问题就必须先期解决。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博弈,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取得两点基本共识:一是台湾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中国政府承诺和平收回台湾(不承诺放弃武力),台湾未回归前两岸保持均势状态。随之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概念,接着在198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对台湾的九条政策,至此,“一国两制”雏形显现。

综上所述,“一国两制”的出台,一方面是世界历史大势的呼唤,另一方面主要也是战后“冷战”时期以中美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博弈的结果。当然基于中美苏三国现实斗争以及国家利益的考虑,中美建交一方面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也更符合中国走出“文革”、走向世界、民族振兴的国家利益。在这一大局下,对于台湾这一特殊地区,中国政府承诺和平统一,并且统一后台湾仍可保留其原有社会、经济制度,已经是对现代资本主义较为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了。但是“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已经表明,“一国两制”既符合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作、协同趋势,也符合港澳台地区的特殊历史背景,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已足以宽慰作出这一历史创举的先辈们的良苦用心了。

二、从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认识和看待 “一国两制”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一方面是衰落史和屈辱史,另一方面则是独立史和振兴史,在这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命运的起落沉浮,与世界上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息息相关,而其间,港澳台等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具有了这样的历史命运。但是,由于港澳

台地区的特殊历史经历,反过来又对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因此,百余年来两岸四地的互动历史过程,又是一个考察和认识“一国两制”的重要视角。

(一)和平统一的制度安排

从香港的角度看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就像一个历史周期的轮回。中国从传统进入近代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是起于中英鸦片战争,起于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起于国家领土的分崩离析。而新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进入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最佳历史时期,也是大致开启于祖国统一大业的重大突破,伴随着“一国两制”国策的制定,相继迎来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祖国。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就是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振兴和民族富强,前者是后者的条件与基础。从历史回溯,晚清政府除了割地赔款,对这一历史使命已经无能为力。而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不可否认,还是在这方面作了其力所能及的努力,也收获了来之不易的成果。进一步走入历史深处看,在这些成果背后我们又会发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价值、两类制度、国共两个政党的既斗争又合作的场景与画面。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四分五裂,列强分而治之。以社会主义为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和以资本主义为追求的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之后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推翻了北洋政府,至少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对于中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历史任务,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而这一成绩的取得,奠基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随后发生的日本侵略,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联合抗日,更是取得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第一次伟大胜利,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一近代重要历史任务的完成以及伟大成绩的取得,还是奠基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

从一定程度讲,国共两党,就是代表了中国内部的两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也代表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间的资源和利益。因此可以推论,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就是中国范围内两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股力量的合作,并且都形成了国家进步的动力,也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自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距离我们最近

的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

经历两次国共合作,体会到这一重要历史经验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面临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中国近代所不断追求的重大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的时候,个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群体)的经历和经验在其决策时就会占据重要地位,不论国共是否出现第三次合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携手合力,对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将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最佳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于是,“一国两制”应运而生;于是,香港、澳门和平回归。

(二) 改革开放的资源整合

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重大历史任务,就是国家复兴和民族富强。如何才能实现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呢?正如前述,首先要实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是国家复兴和民族富强的前提与条件。并且这一历史任务,可以借助“一国两制”这一制度创举来完成。其实,“一国两制”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基本国策和伟大制度创举,还有实现改革开放后进行国内外资源整合,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深层战略考虑。

国家通过“一国两制”这一制度安排来进行资源整合,其精义就是要实现国家和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体系内的优势资源的整合。这一资源整合过程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借鉴与整合。“一国两制”刚开始提出之时,港澳台及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基本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以至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苏、中社会主义实践都将市场经济排除在外,认为这一体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冲突。但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困境,生产关系的束缚和生产力发展的滞后,都指向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陈旧与内在缺陷。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是,“一国两制”制度的开启和推进,以及港澳台商到内地的投资办厂、独资合资,成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并最终成为资源配置最主要手段的重要制度安排。

二是港澳台的资本、技术、人才、项目资源和内地庞大的市场、劳动力资源的有机整合。二战后,港台等地区承接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转

移,经济飞速发展,积累了较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但是由于其人力、市场和资源十分有限,发展到瓶颈,随着国内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尤其是专门针对这些地区的“一国两制”制度设计的出台,对他们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因此,改革开放以及港澳回归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至今中国持有的境外投资数量,港澳台资本仍占绝大比重,反之,港澳台商也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通过“一国两制”这一制度安排,两岸四地实现了共同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三是港澳台地区带动和牵引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和项目进入中国,进一步推高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水平和中国融入世界广度与深度。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港澳台三地较早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们与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十分紧密,许多外国资本在三地都有投资。近年来香港提出充当世界与中国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澳门定位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都充分反映了它们作为世界与中国联系交往中的中介角色和地位。

(三) 治国理政的体制助力

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其异质性和斗争性虽然是隐性的,但却是主要的,然而这又给双方不断完善自身理论和制度提高了警惕和动力。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政胸襟则更为开阔,竟然将异质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直接引入到国家体制的内部,建立“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实施一系列“一国两制”性质的方针政策,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处理内外资本主义问题既提供了直接经验和借鉴,也增强了处理和驾驭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复杂问题的能力,这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大有裨益。

首先,港澳台具有相对发达、完备的城市治理政策体系和现代治理技艺。总体而言,港澳台地区较之内地先行一步,尤其是它们大多经历过与西方发达国家高度融合的历史阶段,从而将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与中国传统优秀的治理文化相结合,在“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下,这些融合中西的宝贵的治理理念、制度和技艺,都很值得内地学习和借鉴。择其要者,有法治、教育、医疗、交通、文化保育、社会服务等领域。

其次,港澳台地区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大大推高了治国理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及十七大以来,中央都将港

澳地区“一国两制”实践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视为治国理政当中的崭新课题和重大课题,必须要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近年来香港特区所出现的政改及普选问题,“23条立法”问题,国民教育问题,“占中”问题,以及新近冒起的激进本土势力等,都干扰到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背离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国两制”宗旨,给中央的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

最后,港澳台地区实行“一国两制”,大大拉近了中国与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将之前相对隐性的矛盾和冲突显性化,给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挑战。从“一国两制”的提出和实践来看,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港澳台地区的角色和作用,存在着两个截然相反的特点,一是“一国两制”制定时的“浓缩效应”,世界资本主义都浓缩到具体的一个当事国,只有它才有资格与中国谈判、博弈;二是“一国两制”实施时的“放大效应”,当港澳台地区发生一些与内地有关的事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欧盟甚至一些资本主义的小国也会发声,集体性干预中国内政。

另外,港澳台地区在实施“一国两制”的进程中,还存在一个“前置效应”,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为了继续维持其在台湾的利益,故意给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制造更多的冲突和障碍,一方面可以为台湾的“一国两制”争取更大的制度优惠空间,另一方面甚至幻想“一国两制”在困难面前难以为继,以致消亡,最终让台湾保持现状。然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一国两制”实践中暂时遇到的困难,一方面会提高中央的治国理政能力,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借着处理港澳地区“一国两制”实践中的复杂问题,进而考虑一揽子谋划和制定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的治理体系和秩序,从而真正担当起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一角度看,此举又可谓“一国两制”的外向翻转和另一版本了。

三、从港澳台百余年的历史看“一国两制”

香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广大港人殷切期盼什么,追求什么;广大港人努力奋斗,创造了哪些成果和优势,这些内容与“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一)解决身份归属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港人经历了被英国占领、租借和被清政府抛弃的历史命运。尤其在英国

殖民统治下,英华分治,华人作为二等公民,无权参与政治,社会生活层面也诸多受限。于是,香港就像漂浮在太平洋上的一艘船,对于英国而言,是借来的地方;对于中国人而言,也像借来的地方,仅作为短期谋生之地或临时逃难之地,为了金钱、为了生命而隐忍了家国之身份的叙事。

但是在紧要关头,港人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又会蓬勃而出。譬如抗战时期的为国效命,重大自然灾害时期的为国捐输,还有日常涓涓细流般地周济内地亲族,然而这些都是时代潮流和文化心理在起作用,而其港英治下的实际身份则显得相当模糊。从而在较长时间内,港人形成了对国家民族爱恨交织、亲疏并存的矛盾心态,甚至不少人还有意无意地淡化了自己的身份属性。

“一国两制”的提出和实践,尤其是香港基本法的实施,最终从国家主权和法律的角度厘定了广大港人的身份问题。飘零的小船终于驶回了港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港澳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法律化和具体化。港澳基本法序言首先指出了这一政治和法律事实,就是港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通过中英、中葡联合声明,确认中国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共同愿望。

中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以后,港澳同胞自然成为中国公民,其身份属性也可通过法律程式予以确认。身份归属问题解决以后,随之而来又产生身份认同亦即国家认同问题。历史往往产生诡异的悖论,两地隔绝时有认同和回归的诉求,两地统一后又有了排斥和分离的倾向。香港回归前后三十多年正在走入这个历史怪圈。香港社会现实已清楚表明,正是香港境内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联合与推动,才使得它陷入这个怪圈,目前还有恶化的趋势。这当然需要中央和特区政府采取更为妥当、周全、坚定的措施予以化解。

但是也可考虑从另一方面开展工作,即通过制度化、人性化的政策手段,来逐渐淡化两地国人的身份分野,最终定格在中国公民的身份和角色。首先,应在国家层面对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施以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这一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要在内地来呈现出来。其次,在港澳台特区内部的中国公民,可以享受其基本法内所规定的相对特殊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既不涉及内地中国公民,也不越出三个特别行政区。最后,当前应考虑从制度上保障港澳与内地的中国公

民享有相对自由、便利的身份相互转换权利。

(二) 踏上民主进程

港英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华人没有民主,或者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和适切的民主。有人会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港英政府不是放开了区议会、立法会的选举了吗?怎么会没有民主呢?这就涉及一个真假民主的问题。

香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快速民主化进程,明显是在七十年代末港督麦理浩访京之后,其加快的步骤也都伴随中英联合声明的发表、基本法的颁布等等重要历史节点,这就一再证明了英国快速推进香港的民主化,暴露出其管治的策略性和虚伪性。一方面英国想笼络讨好香港民众,给港人留下良好的“英国记忆”;另一方面给回归后基本法的贯彻实施制造障碍,破坏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这两方面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英国的角色“回归”,插手香港事务,延续其固有利益。很显然,回归后及目前香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诸多乱象,都与港英先前的布局有关。因此实质而言,这样的民主就是虚伪的民主,也不是适切的民主,不要也罢。

反观回归以来,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发展民主也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主要有四点表现:一是立法会议席不断增加,直选成分不断扩大;二是区议会委任议席取消;三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数量不断增加,行政长官的代表性不断增强;四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法定目标出现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然而,由于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的故意阻挠,广大市民普遍期望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功败垂成。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香港目前开展“双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港人在相关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这随之有引出一个问题,即民主的边界问题,也就是香港到底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民主。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香港基本法已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只是一些人故意扭曲和抛开基本法,从而给香港的民主法治制造了不和谐声音,甚至阻碍了民主发展进程。民主的边界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在逻辑边界,即民主普选的实现条件问题;二是内在内容边界,即民主普选的实质内容问题。

对于前一问题,基本法的逻辑脉络已经说明和解决了,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实践也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贯彻实施的,只是结果不如人意。香港基本法是按照序言、总则、中央与特区关系、居民权利和

义务、政治体制等内容的重要程度依次排列,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相关法律规定内容实施的先后逻辑顺序,前者往往是后者实施的条件。基本法第四章政治体制部分明确规定了行政长官的普选问题,但是该条款的实行,必须有赖于第二章中央与特区关系部分中第23条的实现。正如前述,在香港内外资本主义渗透、联合的大格局下,中央如何保证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怎样保证具有贯彻落实基本法责任的行政长官必须是中央信任的人士,这些都需要第23条立法的完成。它是基本法第45条实现的逻辑和实践前提。这就是香港“双普选”实现的外在逻辑边界。

对于后一问题,基本法也有十分清晰的规定,就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都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这一原则而规定。所谓香港的“实际情况”,就是香港的特殊性,就没有反对派们所一再发力和炒作的所谓“国际标准”,而他们执着此途就是南辕北辙、竹篮打水。什么才是香港“双普选”所遵循的“实际情况”,核心的就是一条,即“均衡参与”。

在行政长官普选中所遵循和贯彻的“均衡参与”,就是要保证社会各界均衡参与所选出的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这样具“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才能行使其实质性提名权力。经其提名后一人一票所选出的行政长官也就更具代表性,更有认同性,就会获得中央和香港市民的双向支持。

在立法会普选中所遵循和贯彻的“均衡参与”,就是要长期坚持和坚决执行的功能界别选举制度。随之而来,有人又会提出功能界别内部是否也要遵循循序渐进扩大民主成分,以及功能界别如何对接普选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次生问题,只有在23条立法完成,行政长官普选实现,讨论这个问题才有现实意义,也才有解决的办法。而在此前,则要对相关选举制度予以固定,以保证选举制度的严肃性、稳定性,减少社会的争议和纷乱。

(三) 发挥独特优势

长期以来,香港发展成为世界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澳门、台湾也同样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港澳回归后,国家通过基本法以法律形式将港澳社会创造和积淀的优秀成果延续、固定下来,使它们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独特作用。今年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张德江委员长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发表演讲,对香港的独特优势

作了权威系统的表述,指出香港具有区位优势、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服务业专业化优势和文脉相承的人文优势。这些优势都非一朝一夕形成的,都是从开埠以及回归以来广大港人努力创造的结果。^[1]

张德江委员长还指出,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作用,支持香港巩固既有优势、开发新优势,支持香港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支持香港拓展国际经贸联系。同时,香港也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发展战略中来。希望香港以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将自身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放大和提升香港的优势。^[1]

澳门同样靠长期积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优势,回归以后优势则更加明显突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10月11日出席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时指出,澳门还有一座更长的“跨洋大桥”,那就是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它以语言文化为纽带、以经贸合作为主题、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澳门的独特优势和平台作用,对推动中国与7个葡语国家加强联系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

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要发挥并进一步提升澳

门的平台作用。澳门拥有独特的中葡双语优势、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商业环境,是联系中国与葡语国家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纽带。中国政府全力支持澳门发挥好“一带一路”支点作用,加快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进一步建设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商品集散中心。^[2]

因此我们相信,在港澳同胞的努力拼搏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港澳地区的原有优势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并能创造出新的优势,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也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也会更加成功。

参考文献:

- [1] 张德江. 发挥香港独特优势 共创“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
- [2] 李克强. 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 2016-10-12.

责任编辑:施业家

(E-mail: shiyejia678@sina.com)

the wake of an incident. As the third party in this collision, the judicial system is impeded by certain barriers in reality, and has failed to live up to its ideal image. Resolving conflicts in medical tension can hardly rely solely o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find new effective solutions.

Key words: judicial system, medical tension, trust, social exchange

A Study of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Disseminate Online Reputation: Based on Consumer Generated Digital Content

(by LIU Quanhong, QIU Yu)

Abstract: There is an inherent consistency in consumers' participation in generating digital content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disseminate reputation online, and the former promotes the latter. Companies must innovate in content, form, and dissemination channel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stomers' participation in creating companies' positive digital content, and achieve companies' positive online reputation dissemination.

Key words: consumer generated content; online reputation dissemination; willingness; brand value

Research on Budget Adjust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by LI Ying)

Abstract: Budget adjust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cess of public budgeting and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use and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funds. A study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budget adjustments in recent years finds that the academia has carried out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about the concept and the scope, the cause and trigger mechanism, the mode and operation strategy, and th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search is a shift from the generalized grand narrative and simple discussion on specific issues to meso and micro levels and from the study of general government budget adjustments to more coverage of budget adjust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s; in terms of method, the research must emphasize creating original concept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 based on Chinese experience and strengthen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n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to break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law and economics.

Key words: budget; budget adjustment; budget implementation; budget monitoring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Cultural Industry from 2011 to 2015

(by CHEN Bo, WANG Ao)

Abstract: Since 2011, China's Internet cultural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all forms have yielded fruitful achievements. As representatives, online games, videos, music, animation, and literatur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cultural industry. Based on the data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cultural industry from 2011 to 2015, the article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nline games, videos, animation, and music,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se four major areas,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ir continu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rnet cultural industry; current situation; countermeasur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ithin the Large Frameworks of the World and China

(by CHANG Le)

Abstract: The gis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lies in the co-existence of both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within the bound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two systems' nature of being homologous, belligerent, coexistent, and modern, we inevitably must understand their origins, difference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from the angle of the greater world history.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world history will provide us with reasonable ground for and self-confidence in the emerge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ic decision.

Key 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Hong Kong; Macao; Taiwan

Rural Inclusive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Innovation : Interaction and coupling

(by LIU Dahong, PENG Xiaoyan)

Abstract: The era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inclusive finance has given new opportunities to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but simultaneously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influence by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innovation and the coupling of the two are crucial.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must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airness, innov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s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rural finance and the value of supervision have changed, the value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needs to be redefined. This study,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and through examining the deviation between rur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innovation, points out that, to correct the deviation and promote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ts supervision, the objective of interaction and coupling must be achieved.

Key words: inclusive finance; supervis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On the Three Fundamentals of the "Original Bill" in the Crime of Dereliction of Duty

(by YU Shujin)

Abstract: The original bills refers to w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e of duty dereliction relies on but are affirmed as separate independent cases by related procedures.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crime that has an "original bill" vary, so it is undesirable to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 "original bill" without considering a particular crime's constituents. In general, the "original bills" are seen as circumstances for adjudgement, but as their contents are different, when part of the content satisfies conviction, the rest is used as circumstance for sentencing. In practice, the crime of dereliction of duty can only be accurately affirmed by grasping the nature of the original bill and the case as well as their internal connections, and treat the original bill as the object of the crime.

Key words: concept, nature, status of original bill; crime of dereliction of duty; corpus delicti

A Probe into the Benchmarks fo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Substantive Norms of Basic Rights

(by WANG Xinsheng, LV Bo)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benchmarks fo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stance of basic rights is importa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basic rights in the practice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s these benchmarks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value constraints of basic rights, but also to the basic right owners' behavior orient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legal interests. In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stance of basic rights, the first benchmark should be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dignity, the seco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finally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Key words: basic rights; interpretation benchmarks, human dignity; equality protection;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Guided-learn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Basic Civil Rights

(by FAN Dianqin, FU Tao)

Abstract: Although the guided-learning method has been increasingly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Constitution, it is still worth discussing how to use it in a specific course. As the course of civil rights stands in a pivotal position in Constitution, the teaching of this module must not be taken lightly in order that students will better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basic constitutional values. The guided-learning method includes pre-course self-study, classroom discussion, concise instruction, and course drills, complemented with case demonstrations. This method places both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s on an equal position and avoids many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lecture-based method. The content of basic civil rights is more vividly presented.

Key words: basic civil rights; lecture-based teaching; guided-learning method; teaching effectiveness